

## 党史里的临夏抗战印记——

## 临夏籍革命青年奔赴延安

临夏融媒体记者  
祁金芳 刘刚林

1932年4月15日,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》在江西瑞金发布,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第一份抗日檄文,标志着我们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对日宣战,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、率先扛起抗日大旗的历史担当。
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如何开展反侵略斗争成为中国面对的首要问题。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,全国各民族、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奋起抗战。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,也成为全国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地。尤其是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学校扩大招生后,更吸引了数万青年报名前往。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接纳各地来延安求学青年的同时,也充分考虑到要坚持全民族抗战,必须全方位培养革命队伍干部,让干部以更高的素质承担起新任务,其中包括对党的民族干部的培养。在这个背景下,地处中国大西北的临夏地区,也有一批热血青年寻找光明,向往革命,追求真理,奔赴延安。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开始锻造自己,其中就有马泳、马锋、牛超甫、马绍常等人。

## 学习理论知识 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

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,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,继而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,但八路军已获大众认可,仍然称为八路军。党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,将原属红一军团的直属回民连30多名指战员送往陕甘宁边区,编入陕甘宁留守部队警备3团,编制仍然是回民连。1938年—1940年,警备3团在瓦窑堡、清涧、高家村一带驻防。1940年2月,警备3团决定派马泳等到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(简称抗大)学习。抗大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最高的军事政治学院,陆续为党培育了大批军政干部。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,并制定了抗大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,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,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”的教育方针及“团结、严肃、紧张、活泼”的校训。

马泳等是抗大第6期学员。马泳入学时,正值全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

1931年9月18日,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,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声爆炸,炸开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吞并中国的狰狞序幕。九一八事变,是一道刻在中华民族脊梁上的深深伤痕。日军如洪水猛兽般席卷东北,无数的村庄被焚毁,无辜的百姓惨遭屠戮。山河破碎,百姓流离失所。在大敌当前、国难当头之时,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,同仇敌忾,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,在中华大地上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。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,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感召下,临夏各族儿女也积极投身抗战,不少青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奔赴前线浴血奋战,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杀敌、视死如归的抗日英雄。地处抗战后方的临夏人民,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中,社会各界、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、进步人士开展不同组织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,激发临夏儿女捍卫民族利益、赶走侵略者的强烈爱国热情,临夏各族人民主动捐款捐物,加紧生产,支援前线,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不畏强敌,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怀,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。

日子,在党的领导下,抗大也开始了边学习、边生产的艰苦生活。学校以窑洞为教室,石头砖块为桌椅,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。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,马泳等人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,非常刻苦地投入到学习中。学员们虽然文化不高,但教员们的水平相当高。毛泽东、朱德为他们所做的演讲令马泳等人记忆犹新。为适应抗战需要,每个学期一般压缩在4个月内。学员毕业后,大多数即刻奔赴抗日前线。但为了培养党的民族干部,马泳这批少数民族学员被留在延安,继续学习。1940年5月,党组织又将马泳转到中共党校第37班学习,同时到中央党校学习的还有东乡族的马锋、穆德彪等。

1941年1月,国民党公然发动皖南事变,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,也给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困难,边区内粮食、物资极度紧张。为了打破封锁,毛泽东发出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的号召,一场大生产运动由此展开。马泳、马锋、穆德彪等在陕甘宁边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既抓好正常学习,又开荒种地,投入大生产运动。在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期间,马泳、马锋、穆德彪懂得了共产党是普天下穷人打天下的人民政党,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,跟着党走,才是正路。在党的培养下,他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,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,愿意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生。

1941年5月1日,陕甘宁边区发布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》,明确提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自治方针与方式,即依据民族平等原则,“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,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”。陕甘宁边区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,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重要实践。而这一纲领政策的出台,是经过细致考察研究的。早在1941年春,延安组织了3个考察团,去曲子县三岔镇等民族地区考察,马泳被任命为其中一个考察团的团长,考察活动为民族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可靠依据。为培养更多的民族干部,1941年9月,在延安建立了民族学院,这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前身。民族学院建立后,以毛泽东的题词“团结”为校风,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为主要任务,马泳此时被组织上派到民族学院第三班学习。民族学院在注重民族干部培养的同时,对各民族历史、语言文字也有所研究。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关怀下,马泳等一批贫苦出身的民族青年先后在抗大、中央党校、中央民族学院这3所党创建的高等院校内学习,并聆听到毛泽东、朱德等讲话,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。

## 投身革命事业 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

党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仅表现在学校的学习中,也十分重视民族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能力的提高。马锋在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业结束后,被党组织分配到镇原三岔区工作。因这里靠近国民党统治区,为方便工作,马锋经常以货郎为掩护,走村串户,发动群众,开展工作。1942年2月,中央组织部派马泳等人到定边、盐池一带搞民族统战工作。1943年11月,民族学院、靖边师范、靖边整训班合并为三边公学,学校的学员边学习边参加生产。马泳的工作也被调动到三边公学,他带领十余名学员到靖边纺织厂学习纺织技术,学成后在三边公学建成学校纺织厂,马泳被任命为厂长,马泳发动群众,加大纺织生产,很快解决了300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。后来纺织厂与生产股合并,需要扩大生产,为解决经费,马泳骑马亲赴延安,找到分管财政工作的南汉宸协商解决经费,购买纺织零件,用于扩大生产,并解决了三边公学经费困难问题。在纺织厂的辛勤工作中,马泳和三边公学的教职员及学员们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
马绍常,回族,广河籍人士。1936年,受党的统战工作影响,在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参加革命工作。1940年8月,在党组织安排下,马绍常来到延安学习,于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2月,党组织派他以八路军留守兵团高级参谋身份,派驻宁夏马鸿逵部任代表,

以争取马鸿逵抗日。1941年春,马绍常返回延安,先后在延安回教救国协会和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。1943年,马绍常根据组织安排准备前往青海开展活动,途经甘肃肃宁县时不幸被国民党当局抓捕,关押狱中期间,敌人多次用刑拷打,使其身体受到严重摧残,1944年经多方营救脱险。之后,根据党组织指示,马绍常先后赴邓宝珊部、马鸿逵部开展统战工作。1946年,马绍常被马鸿逵扣押,至1948年才脱险返回延安。

1942年4月,穆德彪受党组织所派,到宁夏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工作,先后在吴忠堡、陶乐县等地活动,6月在陶乐县被敌人逮捕,关押数天后解送到银川稽查所,敌人对他严加审讯,戴脚镣,施以揭露花等各种严刑拷打,但穆德彪始终坚守党的秘密,没有暴露身份。敌人找不到破绽,将他关押6个月后释放。出狱后的穆德彪,立即赶赴庆阳,向党组织作了汇报。至1945年,穆德彪再次受党组织派遣,准备前往陇西、康乐、宁定等地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工作,在途径隆德时,再次被捕入狱,但他在狱中坚贞不屈,从不透露党的任何秘密。敌人在找不到把柄的情况下,将他随身所带经费及物品洗劫一空后释放出狱。后穆德彪辗转回到家乡东乡车家湾,坚持隐蔽斗争。至解放战争开始后,他与党组织再次接上关系。

这一时期,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组织下,以及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,还有一批临夏各县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,他们之中有牛超甫、牙含章、姚克让、海宝珍、景胜堂等。

牛超甫是康乐县八松乡八松村人。

1940年,他随一批在临洮中学学习的学

子一起奔赴延安。于1942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牙含章,和政县买家集乡团结村牙咀人,早年曾是中共导河特支领导的青年社成员,参加过大革命时期开展的革命活动。他有志于社会科学研究,是一名青年学者。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怀着强烈的救国情怀,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表赞成,并对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十分向往。1938年4月,他从拉萨出发,绕道印度,经新加坡、香港等地到达西安,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表达自己去延安求学的意愿。经介绍,到达延安,先后在陕北公学分校、总校学习。他在延安上学期间积极要求进步,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工作,在党组织培养下,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2月,牙含章从陕北公学结业后组织分配他到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。1942年,牙含章根据在拉萨收集调查的资料,写成约20万字的《青藏调查记》一书。根据党组织工作安排,牙含章又相继在西北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、中央民族学院等处工作。他在为党工作的同时,继续对民族问题进行研究,成为延安时期培养起来的有造诣的民族问题研究学者。

姚克让是和政县城关镇南关村人。1939年,他随国民党军某部在河北省曲周县参加起义,加入八路军。同年3月,姚克让随所在部队到达陕甘宁边区绥德县,他积极要求进步,表现出色,被组织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海宝珍是积石山县郭干乡海家村人。1941年11月,在八路军17团3营9连当战士时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景胜堂是康乐县莲麓乡汪家坪村人。1940年参加革命,根据组织安排,从事运输工作。1945年5月,在庆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这一时期,虽然临夏地区中共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,但中共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对临夏地区的关注,特别是党在延安对一大批临夏籍革命青年的重点培养,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组织在临夏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干部基础。

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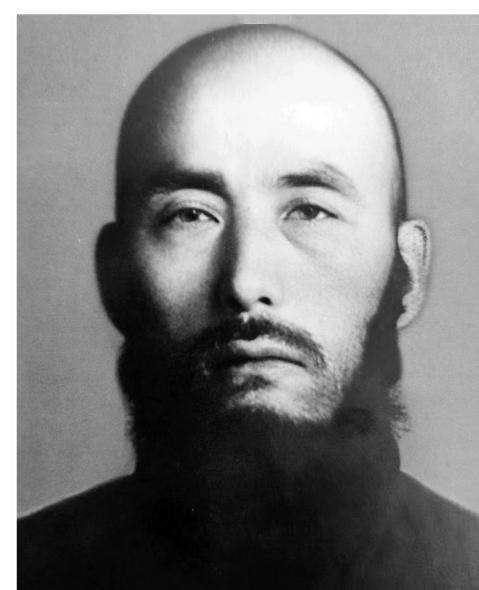
牙含章,和政县买家集镇牙咀人。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受组织派遣到陇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至1949年解放。



牛超甫,康乐县八松乡八松村人。1940年,他随一批在临洮中学学习的学子一起奔赴延安。于1942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

1936年4月,在红一军团第11师回民连。同年8月,被党组织派往延安中央党校训练班学习。



1936年4月参加革命,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